

■ 朱 雲 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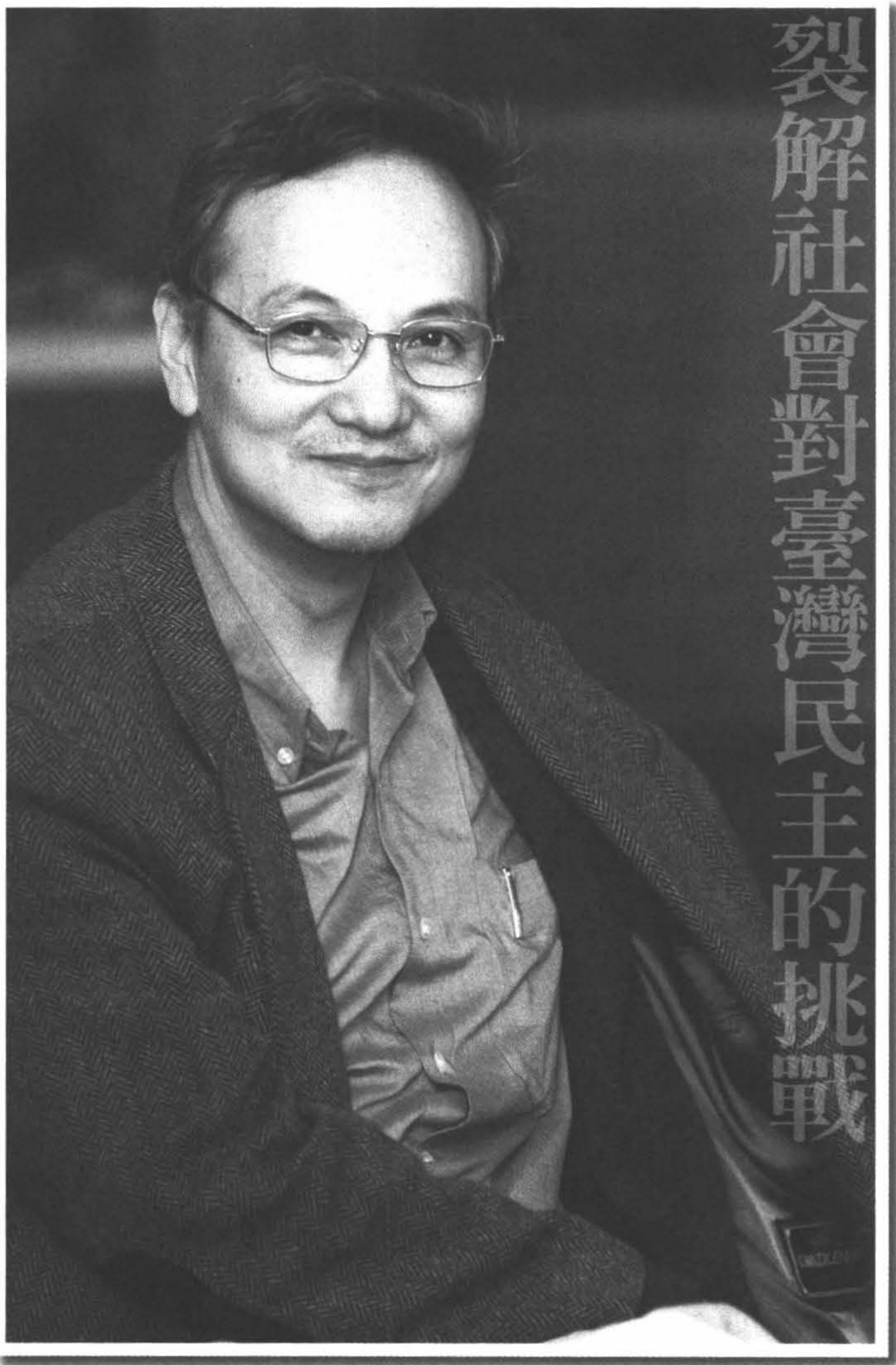
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

現任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暨台灣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台灣經濟研究院顧問。

曾任景文技術院校長、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員。

專業領域為經濟發展、國際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

著作有《台灣廢棄物的趨勢分析》、《東亞雁行理論之研究》、《經濟結構調整與部門間資源配置：1989年間台灣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之比較靜態分析》等中、英文著作。



「一想到葉爾欽曾經用坦克車把議會包圍起來轟，就讓人害怕，」朱雲鵬說：「葉爾欽也是『民選的』總統，可是現在的俄羅斯是個民主國家嗎？大家都知道答案吧！」他認為，民主是很難得到的東西，「卻可以很容易失去。」朱雲鵬帶著極為憂慮的口吻指出：「你看，台灣現在這個狀況，名嘴配合政客，天天吵那些對國家社會發展沒有實質意義的話題，」甚至有往威權回頭走的跡像，「如果僅有的中流砥柱、知識分子又不發聲的話，台灣的民主是會不見的。」

朱雲鵬以陳水扁總統的戒嚴說和中選會組織法在立法院連討論都沒有討論的事情為例說：「這種情形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你能想像英國保守派議員霸住議事台，阻擋別黨議員發言嗎？」朱雲鵬說，提出戒嚴說後，陳總統二十四小時之後才更正，「這是非常嚴重的事，」可是，台灣卻沒有聽到太多指責的聲音，「這對台灣民主的傷害太大了，包括我自己在內，知識分子真的應該要好好檢討。」

朱雲鵬說，民主、法治與包容是社會走向進步很重要的三個指標，但是台灣這幾年，「民主被糟蹋，法治被侵蝕，社會包容愈來愈小，」這是危險的訊號，「從中南美一些國家的例子，我們可以很清楚發現，當這三個指標往下走的時候，就表示這個國家將會從民

主走回威權，」所以台灣目前的發展，「是十分令人擔心的。」

朱雲鵬認為「就讓台灣多一點政黨輪替吧，」不讓哪個政黨長時間執政，也免除整個社會擺脫被政黨綁架，「以公務人員為例，政黨輪替多了，他們才會理解，沒有政黨是永遠當家的『主子』；了解到服務的對象應該是人民，公務人員的中立性才會建立。」

話說回來，朱雲鵬認為，未來不論哪個政黨執政，一定要好好處理「台灣裂解的問題，」因為台灣南北發展不均的事實已經成為社會分裂的催化劑，也是進一步造成上述三個進步指標惡化的深層因素。朱雲鵬說，台灣重要的經濟活動都發生在苗栗以北，「從竹南到台北內湖，這一條『科技走廊』大概貢獻了台灣八成以上的外銷額，」但是南部地區卻發展遲滯，生活的困境使得他們很容易被一些簡單、狹窄的政治主張、口號所綑綁，以為那裡面會有出路和尊嚴，事實上，政客只是把台灣帶向更多的對立。

朱雲鵬期許執政者應該要努力縮小貧富差距所深化的南北撕裂，趕緊讓中南部人民的生活好起來，「活絡經濟、提高就業，幫助他們同樣能夠享有全球化經濟的果實。」讓人民生活更好，也讓台灣民主自由化的道路可以更平穩長遠地走下去。

裂解社會對臺灣民主的挑戰

朱雲鵬

過

去臺灣家庭所得分配中，最富五分之一與最貧五分之一兩者間的比率不到五，然而，隨著M型社會的來臨，此一比率有逐漸擴大的趨勢，既有的紀錄顯示，此一比率曾達到六·四，而根據主計處二〇〇〇五年最新的資料顯示，目前是六·〇二，但這些數據可能低估不均度，其理由為：第一，一般在進行家庭所得分配的統計過程中，無法取得最富有與最貧窮的家庭資料，這是由於最富有的人不願意因接受調查而導致所得曝光，另一方面，最貧窮的人鎮日忙於張羅生計，通常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接受調查。儘管主計處對「記帳戶」（一部分的樣本）提供津貼，但領取津貼者必須每天紀錄每一筆開銷支出，其過程之繁複使得許多人寧可放棄津貼。

以過去的臺灣社會而言，絕大多數的家庭屬於中產階級，最富與最貧的家庭只是少數，此一數據失真的程度較小。但當一個社會逐漸趨向M型化的兩個極端時，低估的誤

差亦隨之逐漸升高。第二，此項統計資料僅調查家庭所得而非財富，但影響力更大的的是財富多寡，但許多臺灣的富人在帳目上做到沒有收入，不必繳稅，如此也使數字失真。第三，當前國人將財富存在國外的比例很高，據估計約有四兆九千億臺幣的財富存於海外，這些資產的所得亦不會記入所得分配的資料當中。

所得分配資料失真的情形在日後恐怕更為嚴重，因為從民國九十八年起將實施最低稅賦制度，屆時所有海外資產所得，只要每年超過一百萬元，均須納入所得稅的申報。許多富人將資產置於國外是為了逃避國內的遺產稅制度，或是不希望政府掌握其資金運用方式及流向（如臺商赴大陸投資）。一旦最低稅賦制度開始實施，凡資產所得達到最低稅賦制度的門檻必須申報所得稅，富人們的實際資產總額將有曝光之虞，對許多資產豐厚的人而言，這是他們不樂見的情況。因此，臺灣目前許多富人正積極進行一項全民運動，即為將海外資產以信託或其他方式予以隱形化，以利將來身故後可以直接將資產轉移至繼承人而無須負擔任何遺產稅。

由於避稅的方法日新月異，加上許多富人實際獲取避稅的好處，使得更多原先未將資產置於海外的國人，也想趕搭這班列車。也就是說，避稅方法的創新不僅讓原先將財富置於海外的國人將其財富隱形化，同時也鼓勵未將資產移至海外的國人更積極地將其財富往國外遷移、隱形化，無怪乎臺灣金融業在今年一月到八月的就業所得呈現負成長

六%。此外要特別提出的現象是，國人資金流出海外購買證券及債券的金額，僅僅今年上半年即高達一百八十億美金，其中多數交易是國人直接在海外開戶，而非購買國內金融機構所發行之海外基金。

房地產的銷售情形也顯示出M型社會的來臨。以早期房地產的銷售來看，三十到四十坪為主力坪數，佔所有新推銷售案的最大宗，但目前很少的售案是推出三十到四十坪的房屋，此現象尤以台北市最為明顯，建商所售出的房屋不是六十或七十坪以上，就是十到二十坪的套房。富人不覺得六十到七十坪，總價四千萬元以上的房子貴，但多數中產階級無力負擔，只能購買十到二十坪左右，總價一千萬元以下的房屋。所以，從房地產市場推案的差異情形，亦可看出M型社會的來臨。

M型社會的衝擊不僅涉及國人的所得與財富，亦涉及臺灣的南部與北部兩大區域。比較而言，北部基本上較為融入全球化的潮流，與中國大陸較有密切的經濟關連，並在全球化的風潮下獲得相當的收益及財富，相對而言，南部則多數受到全球化潮流的損害，如傳統產業的就業機會大幅消減，導致國人的收入差距也反應在南北差距，這些差異致使臺灣形成一個撕裂的社會。由此可知，臺灣政壇上藍綠的撕裂有其經濟上的背景。

未來若要解決貧富差距或南北撕裂等問題，唯一方法就是「民主」。一個民主社

會中有不同的意見共存很正常，大家辯論，而由人民做出選擇。最重要的是，民主必須奠基在法治之上，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然而，民主與法治在當前臺灣已面臨重大挑戰，甚至有人認為臺灣已逐漸往威權的方向走回頭路，只不過以前所供奉的神主牌與現在的不同的。我們試舉一二：第一，報紙報導指出現任總統曾考慮實施戒嚴，他隔了一天才否認，這是匪夷所思的事。第二，臺灣電視公司民營化的過程中，政府的黑手明顯介入，導致本為單純的企業轉換過程完全變調，可見所謂「黨政軍退出媒體」是假象，相反地，政治操控媒體之程度恐怕遠超乎一般人民的想像。第三，執政黨立法委員以拳頭阻止「中選會組織法」進入討論（不是表決）程序，已經四次。令人驚訝和匪夷所思的是，當這些事發生時，沒有知識份子站出來譴責，沒有公民團體出來講話，均變成「沉默的羔羊」。

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由民主政體轉變為威權時有幾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社會上開始有人使用不民主的、粗暴的語言來陳訴他們的意見，例如：目前國內的GIIH節目中，部分與談來賓主張假若有縣市不願服從中選會一階段領票之決議，就派遣軍警逮捕相關人員，此類言論即為威權語言，令人擔憂的是，目前這類威權語言的聲音有日趨壯大的跡象，但沒有任何譴責他們的言論出現，無人出面捍衛民主。在第二個階段中，既然威權傾向大聲，又無人維護民主法治，實際威權性的行動就會出現，但是從微

小的事情作為開端，讓人民毫無警覺，之後再一步步擴大，最後變成實際威權；在目前屬於超級總統制的言論和實際運作下，更令人憂心。二次大戰時，德國的經驗就是最好的借鏡，當年希特勒並非在瞬間由民主政體轉為獨裁統治，納粹屠殺猶太人也不是一次就將全數的猶太人屠殺殆盡，而是先逮捕一小批猶太人，其他猶太人存僥倖心理，認為事不關己，接著政府便逐漸擴大逮捕人數。非常不希望臺灣將來會步上這條路。已故的溫世仁曾說，每個國家有其平台，也就是「秉賦」。他說，臺灣的秉賦是創新、開放，且這些秉賦最重要的基礎就是民主、自由與法治，一旦這些基礎被剝奪，臺灣生產力上升的靈魂將隨之殞落，將導致許多臺灣人才離開臺灣，競爭力也將逐漸沉淪。

經濟歷史學家Cipolla曾說，西歐的經驗顯示，文化、政治或社會階層方面包容力愈低的國家，其人才逐漸轉移到他國，是影響各國不同經濟表現的最重要因素。（『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the countries in which intolerance and fanaticism prevailed lost to more tolerant countries the most precious of all possible forms of wealth: good human minds. The qualities that make people tolerant also make them receptive to new ideas. The inflow of good minds, and a receptiveness to new ideas were among the main sources of the success stories of England, Holland, Sweden, and Switzerland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這些話值得

當權者與每位關心國家未來前途發展的人深思與警惕。